

第一编 近代化过程中的 中外关系演变

本编不是从外交关系上，而是从封闭、开放的角度，去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开放和封闭是相对而言的，知道了什么是封闭，就知道什么是开放。绝对封闭指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没有任何的交往和联系，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相对封闭而没有绝对封闭。由此推论，开放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从宏观看，如果以实行闭关锁国的清乾隆年间为起点，可以说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外关系是经历了主动封闭、被迫“开放”、被迫“封闭”、主动开放四个阶段。前后两次封闭与开放，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因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后果。本编将以三章的篇幅，剖析每一阶段形成的原因及其利弊得失，并从中引出经验与教训。从开放和封闭的角度，去考察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全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的关系，认识当代中国摆脱了被迫“开放”和被迫“封闭”的苦难之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 中国与世界

比清王朝建立早四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近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逐渐成为一个整体。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能适应这个世界潮流的变化，丧失了领先地位，并开始进入由强变弱的恶性转化阶段。当时的中国与正在崛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究竟缺少些什么呢？

为了寻得正确的答案，有必要比较一下15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郑和“七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两件耐人寻味的大事。从发生的时间看，中国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明永乐3年（公元1405年），比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从西班牙出发向西探险要早87年。从技术和经济力量看，前者更是大大胜过后者。郑和出海首航船只208艘，船员27800人。其中大船（62艘）长150多米、宽60多米，有人估算达1500—2500吨级，比哥伦布首次率领的3只船不足90人组成的舰队中最大的船要大十余倍。实力对比如此悬殊，使美国人金格里奇十分感叹，他在《机会之窗》（曾为美国前总统里根称赞的未来学著作）一书中写道：公元140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探险王国。那时他们的舰队比欧洲任何舰队都强大得多，他们到过遥远的印度

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探险。若能继续下去，也许他们已在非洲之角击败葡萄牙，并在大西洋沿岸与其相遇。但是，两者后来发展的轨迹和所得的实际结果，却与这位美国人假设的前景完全不同。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船队规模虽小，但其向东方世界探寻财宝与开拓市场的目标是明确的。舰队出发前，西班牙国王任命哥伦布为新发现的一切海岛和大陆的司令、副王和总督，并宣布从其海外所得财物中支付与这些职务相符的薪俸。因此哥伦布视自己所到之地均为西班牙之殖民地而加以命名。他们一面大肆掠取财物，一面努力铺平与新开辟地区建立商业联系之道路。西班牙的航海成就，刺激了葡萄牙人的活动。1498年，奉葡王之命的达·伽马，开辟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扩大了它们的世界市场，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使西欧一些国家迅速告别封建时代，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带来财富和开辟市场，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耗费。郑和之后，明朝统治者放弃了远航事业，而且为了绝后继之人，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加以销毁。到了16世纪，正当中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萌芽需要向海外开拓市场时，统治者却下令不准民间造大船，发现违禁大船尽数毁之，使海禁升级。清王朝开始的20多年中，亦曾5次颁布禁海令，3次将东南沿海居民后撤，制造几十里无人隔离区。直到台湾统一后，康熙帝才在禁海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是对通商口岸、商人、船只、贸易对象和商品仍有许多限制。以后虽还有“严禁”与“弛禁”的起伏变化，但总的态势是越来越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缺少的不是技术、商品、经济力量和人才资源，缺的是外向和开放机制。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沉积下来的诸多因素的综合反应。因

此，要弄清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必须从古代中国讲起。文明发达的古代中国，曾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然而封建主义的持续强大却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在资本主义阶段的落伍。兴盛转为衰败，强大变成虚弱，这种强烈的反差是整个中华民族所无法接受的事实。清王朝中叶比较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作为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手段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它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本章将根据上述思路，展示古代中国由强变弱的曲折历史过程，阐述崛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冲击，分析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深刻历史原因及其严重后果。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兴盛与衰落

一、文明发达的古代中国

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画卷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幅血迹斑斑、触目惊心的图画。中国人被外国侵略者讥笑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为了驳斥这种论点，为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了正确认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重温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

【优越富饶的自然条件】我们伟大的祖国，屹立在亚洲东部，总面积与欧洲相当，约 1000 多万平方公里。陆地边界长 20000 多公里，大陆海岸线 18000 多公里。它幅员辽阔，气候适中多样。全世界主要农作物和经济林木几乎都能生长，种子植物超过 3000 种，动物资源也在 2000 种以上。地球已知的 140 多种矿藏，我国基本上都有，其中煤、铁、石油等 20 多种居世界前列。我国水力资源也极丰富，超过美国和前苏联之总和，为世界之冠。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之后，以禹为代表的夏后氏家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他们地处中原，条件优越，把自己看成天下的中心，后人称之为“华夏”族。“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以后大统一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以后出现的汉、唐盛世，又给我们带来了“汉人”、“唐人”的称谓。此后，在祖国的大地上，各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纷争，终于形成了包括 56 个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具有 5 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虽出现过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历史始终没有中断。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改祖换国的记录，这是每个中华儿女的骄傲和幸运。

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而不中断，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维系自身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形成这种内聚力和向心力，除了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外，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我们很早就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形成统一的汉文字和文化传统。汉字是世界上别具一格、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表达工具。几千年来，它和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伟大民族相结合，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使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不仅不能改变汉文化，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纷纷学习汉文化，实行种种汉化政策和措施。因此，在我国始终没有出现改祖换国、中断历史的局面。第二，中华民族爱国正气源远流长，能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保持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这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把几十个大小民族稳固地聚集在一起。第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

他们代代相传，从未中断，从未失掉民族自信力。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他们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百姓安居乐业，他们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甚至舍身求法。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几万万同胞就凝聚在他们周围，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

【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曾以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比欧洲早 1000 年以上。秦始皇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在地主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不仅是 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他宣布废除分封诸侯制，代以郡县制；废除土地的贵族所有制，代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制；并且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法律、历法等一系列制度。这些经济、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16 世纪以前，中华民族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是不奇怪的。

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农业一向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农具。世界上不少农产品是我国最早种植的。古代中国不仅农业生产实践先进，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系统的农业耕作理论的国家。公元 6 世纪，我国古代著名农业科学家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是世界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农书。书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绿肥轮作制度，比欧洲开始推行轮作制早 1200 多年。《齐民要术》还主张人工选育良种。对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给予充分的肯定。

冶炼技术是衡量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在这

方面我国也走在世界前列。公元前 513 年，我们已经能冶炼铁水，铸造铁鼎，比欧洲国家冶炼铸铁要早 1000 多年。公元 5 世纪，我们开始用煤炼铁，比欧洲早 10 个世纪。至于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闻名全世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不必赘述了。

以举世闻名的两大工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工程建筑，亦令人赞叹不已。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我国隋代开凿，元代改修的京杭大运河，它纵贯京津两市和冀、鲁、苏、浙 4 省，全长 1794 公里。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就是我国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绵延起伏 12700 多里，如果用修筑长城的砖石建成一条厚 1 米、高 5 米的墙，能围绕地球赤道一圈。长城是世界建筑奇迹。除两大工程之外，我国还有许多世界闻名的工程建筑：建于公元前 3 世纪、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隋代的赵州桥，1300 多年来，经受多次地震和洪水考验，至今仍非常坚固；面积相当于现今西安城 10 倍的唐代长安城等等。这些都是世界古代工程建筑中的明珠和佼佼者。

以造益人类的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科技成就，更为世人所瞩目。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用磁石做成“司南”；北宋科学家沈括发现磁偏角，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而欧洲到公元 1200 年才有关于指南针的记载。西汉时，中国已用麻造纸，东汉蔡伦等人进一步发明用树皮等植物纤维造纸，比 12 世纪后才学会造纸的欧洲，起码领先 1000 年以上。7 世纪初，中国创造了雕版印刷，比欧洲早 800 年；宋朝毕升创造了胶泥活字印刷，比德国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早 400 年。公元 7 世纪唐朝人已掌握了火药的配方，公元 904 年中国开始用火药制成火箭，用于作战。欧洲得到火药知识，使用火药武器，是 13 世纪以后的事，也比我国晚好几百年。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纸张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使教会不能垄断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反封建斗争。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使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成为城市新兴

势力反对封建贵族的有力武器。指南针被普遍使用，使得远洋航行具备了条件，对于地理大发现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他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但是必须指出 马克思说的“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是指这些发明传到西欧以后的作用，它们在中国就没有产生这种功能。

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居世界前列。我国文坛巨星数以千计，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唐诗是古代诗歌顶峰，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为世界少见。仅杜甫诗著，现已出版了 15 种语言、120 多种译本。我国的历史学同样悠久发达。历史文献数量之众多，体裁之齐备，为各国罕见。一部《二十四史》，就有 3249 卷，约 4000 万字，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清朝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历史，堪称世界第一。我们的祖先还创造了大批优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作品，构成了灿烂夺目的古代艺术宝库。我国的古典哲学也不逊色。从周代的周公、孔子到清代的王船山、戴震，各个时代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在继承原有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对新的世界、新的事物不断进行探讨和追求，使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不断向更高的水平深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与欧洲哲学、阿拉伯哲学构成世界三大哲学体系。以上所介绍的中国古典哲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尚未谈到的宗教等方面的综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

怎样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是既然涉及了传统文化问题，有几点看法必须说明，供读者参考。第一，

传统文化生存于人们的不断理解和解释之中，是活生生的现实，不是过时的、僵化的死物。对待传统文化，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新的解释，加以发展。抛弃传统，与传统决裂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学习和消化外来文化优点的结晶。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大体上有 4 次：第一次是从汉朝到唐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从唐朝到宋朝，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传入；第三次是宋以后到明末、清初，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传入，但这次文化的传入不久就被打断了；第四次是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尚在进行之中。这几次外来文化的传入，都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 5 千年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素为国际所重视。第三，任何外来文化只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中国化之后，才能为我们真正接受。否则，即使再好的文化也是不能产生作用的。第一次印度佛教文化传入，并影响我国文化，就是经过了“正—反—合”的过程。它先是依附于我国原有的“道术”、“玄学”流传开来，发生影响，接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推进了各自向前发展；最后佛教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此时佛教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到了近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经过类似的过程。只有当它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才真正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此，鼓吹全盘西化，不仅在内容上是不可取的，就是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第四，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决不能再采取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有这些，才能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繁荣昌盛的世界强国】古代中国制度先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辉煌，犹如光射四海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除向东直接影响朝鲜、日本外，还经过陆路和海路向西、向南传播。陆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它既是一条商业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路，把中国古代文明播扬于西亚、北非、欧洲，再从欧洲流传到美洲和大洋洲。海路是从东南沿海出发，经过台湾海峡，进入东南亚各国，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更西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在一些日本学者的心目中，“中国，乃东洋文化之母国。”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向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学习是很幸运的。”统一的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也曾多次嘱咐教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现今世界各地留学生纷纷涌向西方发达国家，然而在古代情形却不同。盛唐时期的中国，对当时不少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日本和朝鲜纷纷派遣人员到我国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天文历法、医学、文史等，很多人还参加长安的科举考试，考了中国进士后再回国做官。仅日本一个国家，就先后派出 18 批“遣唐使”，人数多的达五六百人以上。

读者如果想更具体地了解中国过去的形象，请读《马可波罗游记》^①。马可波罗以自己亲身经历，对中国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它让我们看到祖先当年繁荣富强的情景。

马可波罗，威尼斯人，公元 1271 年随父到东方，长期居住中国，也游历了其地一些国家，1295 年回国。当时我国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马可波罗目睹中国周围一些地方很落后，进入中国看到遍地是宝，到处是新鲜事物，感受颇多。由于本人不会写文章，回国后就口述，由别人代写出《游记》，成为轰动欧洲的名著。《游记》叙述他从北往南的一路见闻：在北方看到中国人烧煤煮饭觉得奇怪，以“燃烧如木材的石头”一节作介绍；称赞太原“很大，很美丽”，“商工业皆很发达”；开封“极其繁华富厚”；“养生必需品皆甚富裕”；“济南”商业兴旺，“是极大的富源”；“兖州、襄阳不错，镇江、常州、苏州更好；到杭州就目瞪口呆，说它‘实在是世界上最繁华、最有钱的城市’，难以笔述。但是必须指出，《游记》对中国的某些记叙明显有夸大，这是一个后进者宣传先进者时难免出现的情况。

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为什么曾经比中国落后 1 千多年进入封建社会的某些西欧国家，崛起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时，中国却仍在封建社会踏步不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即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缘故吗？显然不是。大量事实表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不比西欧晚。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萌芽，是 14 和 15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中出现。按传统说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发生在明朝中叶，即 16 世纪中叶，也有少数学者证明它出现在宋代乃至唐代。但是同样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在中国却发展缓慢。这表明持续强大的封建社会已经向反面转化。弄清这个问题 可以使我们从本质上了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从历史根源上探讨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的道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地主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经济原因】中国的封建制度，自战国后的两千多年中，其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地主制经济，与欧洲占封建经济主要地位的领主制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一段比较短暂的、类似欧洲领主制的封建经济，就是西周时期实行的井田制和农奴制。但是这种封建经济制度，到东周初年，随着贩运性商业的出现就开始动摇了。这种贩运性商业，利用地区差价和供需失调，赚取高额利润，很快积累了大量货币形态的商业资本。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它不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乃成为社会游资，冲击世袭土地所有制，迫使土地成为商品。到战国时期，井田制被彻底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地主制，到秦汉年间定型，一直保持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主制经济开始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到后来就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桎梏。

公元 5 世纪，欧洲完成了从奴隶制经济向领主制经济的过渡，开始了封建时代。尽管土地仍是世袭领地，不能自由买卖，但是奴隶主已变成了领主、庄园主，奴隶变成了农奴。农奴以一部分时间在领主的公田上服无偿劳役，余下的时间就可经营自己的农田，开始有了农奴经济。从此以后，在长达 1 千年的欧洲封建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形态始终是领主制，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才使这种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不同，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特点。

地主制经济，是以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基本特征的。财产继承法则是实行传统的遗产均分制。西欧的领主制经济全然不同，他们的土地属于王有，领主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财产只世袭给长子。地主制经济与领主制经济比较，有下列特点：

第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前提的地主制经济，其必然结果就是土地被兼并，两极分化。皇帝、贵族、官僚、豪绅地主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耕种土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欧洲领主制情况就不同。领主的土地是世袭的，农奴的份地是领主配给的，在一个庄园内是均等的。所以，无论是领主的公田还是农奴的份地，都不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产，不可能出现中国那种两极化的现象。

第二，榨取农民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的残酷剥削。在地主制经济中，地主把土地佃给农民，收取实物或货币地租。多收一份地租，地主的财富就多增一分。土地兼并不断发展，又使社会上存在的大批“无立锥之地”的农民，争抢着佃耕地主的土地。使地主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把剥削率提高到领主制经济不能达到的高度，不但占有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甚至把农民的必要劳动也一部分或大部分剥削去了。这种情况，在领主制经济中是不可能存在的。领主制经济是以剥削农奴的剩余劳动即劳役地租而建立起来的。为使领主经济的再生产过程能顺利进行，首先就必须给予农奴一定数量的土地，使他们得以建立自己的经济来保证其本身的再生产。此外，还必须使农奴有足够的时间来经营其经济，不能因剥削过度而把农奴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打断。可见，领主制经济的存在是以农奴经济的存在为条件的，如果破坏了农奴经济，也就破坏了领主经济。这种客观经济规律，使得领主对农奴的剥削是一种不死不活的剥削，相比之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更

残酷。

第三，土地占有权的高度集中和土地经营权的极端分散。在领主制经济中，领主或多或少地参与庄园的经营管理；庄园中的农奴不能按照各人的意志经营自己的经济，他们的活动必须由全体农奴来决定，一个庄园往往是一个经营单位。因此，领主制经济不可能出现土地占有权的高度集中，也不可能出现土地经营权的极端分散。中国地主制经济则不同。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绝不是为了自己经营。使用和经营土地的是那些“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穷人。他们只能以个人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不能也不敢多佃土地，一般农户不过佃耕三亩五亩、八亩十亩，永远不会有对土地的大量投资的租地企业家出现。至于人数不多的自耕农，也没有形成大量投资的特殊途径，他们多年辛勤劳动的积累，已全部用于购买土地，不再有余力来改善经营或扩大规模。因此，地主制经济就其规模来看，是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落后的小农制经济。

第四，货币财富投向土地或转为高利贷资本。对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欧洲领主制经济，这种状况是不容易发生的。然而在地主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它却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由于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生产手段和财富的最稳定的保障，既可以生息，又容易保持，没有被偷盗、抢劫、焚毁、损坏的危险，因而成为社会上各种财富之最后归宿。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过着“今日完租，明日乞贷”的生活，于是给高利贷资本的繁殖，开辟了广阔的园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尽人皆知高利举债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慢性自杀行为，但是贫穷和不幸却又逼迫着农民不能不坠入高利贷的网中。

上述地主制经济的几个特点，无一例外，都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因素。必须指出，这些特点不是并列的，更为本质的，起制约作用的，是地主对农民剥削的特点。从经济发展的

规律看，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极端贫困和落后，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停滞在薄弱贫乏的小生产方式基础上。这种男耕女织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既不可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商品，也不可能为它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社会各种形态的财富都纷纷投向土地和转为高利贷资本，又堵截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所以，在地主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尽管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它的发展却是十分缓慢的。

【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政治原因】政令、军令高度统一，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特点。它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样是不利的。

欧洲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松散的，它同时存在着庄园和城市两个中心。庄园是封建领主控制的、自然经济的核心。城市是独立的、自由的工商业中心。每一个城市都各自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单位，有行政和司法机构，有自卫的武力，有自己的货币和自用的度量衡。城市的市民，是对封建领主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自由居民，后来正是从他们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欧洲封建社会的松散性，使封建统治阶级对一些城市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不可能十分有力，对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则不然，它的政治经济结构始终是统一的，不存在欧洲中世纪的两个中心的状况。中国的城市，从古代到近代，都是地主阶级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控制着周围的广大农村。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统一性，不但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不是两个互相分离的体系，而且还表现为全国各个经济区域和各种行业交织在一起。至于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更是历来如此。高度统

一，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对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特别是当他们总结长期统治经验，形成抑商政策的禁榷、土贡、官工业等三项制度之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就更为困难了。

禁榷制度就是官营工商业。封建国家把销量最大和最有利的一些工商业，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经营，故名禁榷。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只有食盐和铁器这两种绝对必需的物品，消费者不能自己生产，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所以国家最早禁榷的是盐、铁，后来扩大到茶、酒、矾、香药、宝货等，把最有大量发展可能的工商业从私人手里夺过来，改为官营，于是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便被堵塞了。土贡制度是一种赤裸裸掠夺，统治阶级把自己所需要的大量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都越过商业程序，不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而以“任土作贡”的方式，直接向民间索取；而且贡无一定的范围，可以予取予求。这样，就把商品经济的一个很大部分，从根本上取消了。官工业制度是与土贡制相辅而行的。由于统治阶级公用和私用的各种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和各种军需用品，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既不能全由贡物来满足，又不愿从市场上购买，于是便建立起规模宏大和种类繁多的官工业来自行制造。这样就把本来可以自由发展的极大一部分工商业，又从根本上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了。

【封建思想束缚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文化原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文化。它糅合了经济、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宗法等权威力量，蒙上了一种由礼法、政教、习惯、传统等力量交织的外衣，又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因此对被统治者的约束力量显得特别强而有力。它有积极的作用（上一目中已详细论述

了），也有不应忽视的消极作用。这种封建主义思想，按士、农、工、商四民说，把人分为四等，视经商者为“小人”，并使之僵化为一成不变的传统；它要求人们按“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进行修养，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它以禁锢思想的八股取士的方法，引诱有作为的能人，走上尊孔读经的仕途之路；它把自己看作天下的中心，孤芳自赏，安抚“四夷”，缺少外向、开拓精神。凡此等等，从思想文化上，形成了一种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无形的力量。因篇幅限制，思想文化原因就不详细展开叙述了。

综上所述，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窒息了商品经济的生机，扼杀了商品经济发展变化的动力。因此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社会经济长期处在一种发展迟滞的状态中，尽管早就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却发展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还没有越出萌芽阶段。这就是繁荣富强的古代中国，到近代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面的主要原因。

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发展缓慢，但是毕竟还在向前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夜，已经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很遗憾，此时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与迅速崛起的西欧资本主义，使我们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三、封建社会的衰落

公元1644年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清朝的统治开始是强大而有力的，出现了康熙、雍正、乾

隆三代全盛时期（1662 至 1795 年），曾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表明清政府当时的国势还是比较强盛的。但是好景不长，到乾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进入衰世。

【政治黑暗，吏治败坏】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历代都有，康熙末年以后，这种厮杀更加激烈，诸王贵族间围绕皇位继承权展开的角斗，就是突出的一例。公元 1675 年（康熙十四年），清圣祖玄烨把次子胤祁确立为皇位继承人。未想到胤祁在一些人支持下，窥测机会，图谋不轨。玄烨昼夜戒慎不宁，不得不将其废掉。皇太子之废给久欲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其他诸子提供了机会，造成彼此间更为激烈的争斗。他们勾结大臣，结党营私，形成了太子党、长子党、四子党、八子党等集团。诸皇子时时刻刻准备杀死对手，也随时随地提防自己被杀，提心吊胆过日子。有的畏人暗害，每夜各门加锁，窗楞俱用板钉。雍正继康熙皇位之后，对诸皇子横施折磨，不置于死地，决不罢手。同时，对帮助自己夺位之功臣大挥屠刀，狠下毒手。这种斗争以后一直存在，它是地主阶级内部厮杀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诸王贵族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矛盾之外，还有官僚和官僚的相互倾轧，以及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他们的内部厮杀，是为了争夺压榨劳动人民的权势。因此，一旦权位争夺到手，就大肆搜刮，大臣们贪污受贿也就比比皆是。乾隆的宠臣和珅就是一个典型。他掌权的 20 年中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乾隆死后第 5 天，嘉庆就宣布和珅 20 条罪状，将其革职拿问，不久赐死，并从他家中抄出财物总计 10 亿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20 年的国库收入。因此“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在京城广为流传。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回广东原籍，一路上随带物品之多，排场之大，骇人听闻。有人亲见其扛夫搬运箱笼什物过境，每日